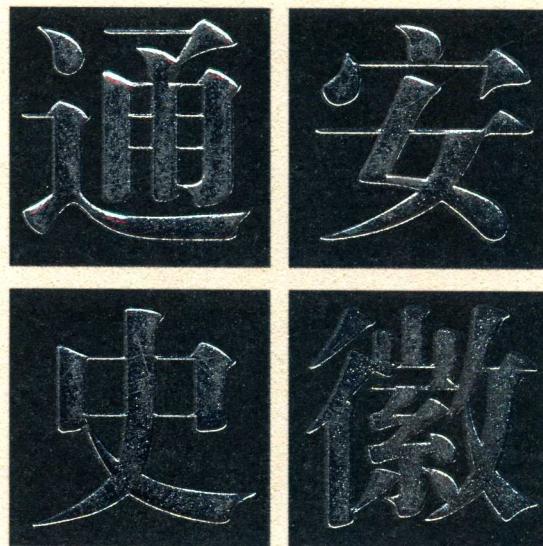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 编

7

清代卷(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 编

安徽通史

清代卷

(下)

7

主 编◎汤奇学
副主编◎周晓光
施立业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

主任：臧世凯

副主任：黄传新

委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世华 王光照 王鑫义 田海明

朱玉龙 汤奇学 杨俊龙 李修松

李琳琦 沈葵 宋霖 张子侠

陆勤毅 周怀宇 房列曙 施立业

唐先田 黄传新 臧世凯

学术顾问：（以姓名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彦民 王健 李昌宪

夏维中 徐光寿 童志强 瞿林东

目 录

第十一章	西方势力全面进入安徽	503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进入安徽	505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从事教育、医疗和慈善活动	516
第三节	传教冲突与教案交涉	523
第四节	安徽被迫开放	575
第十二章	寻求经济近代化的早期努力	593
第一节	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初期发展	595
第二节	近代矿业的发展	615
第三节	铁路、轮船航运和近代邮电事业的开创	634
第四节	近代商业贸易	679
第十三章	新式教育和新文化事业的开创	703
第一节	教育体制的变革与近代教育的开始	705
第二节	新式普通教育的开创	717
第三节	近代师范、实业教育和军事教育	737
第四节	留学事业	752
第五节	近代报刊和图书馆事业的开创	761

第十四章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在安徽	773
第一节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新思想的传播	775
第二节 革命组织的出现及其革命活动	782
第三节 三次武装起义	793
第四节 安徽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	809
第五节 立宪运动在安徽	819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及清政权在安徽的终结	831
第一节 人民的抗捐斗争与饥民暴动	833
第二节 安徽的光复	843
第三节 安徽光复后的政局动荡	867
第十六章 旅外皖人的业绩	879
第一节 皖人与《明史》、《四库全书》的编纂	881
第二节 程长庚、杨月楼等与京剧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888
第三节 包世臣和王茂荫的经济思想	892
第四节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902
第五节 孙家鼐、吴汝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920
第六节 周氏、孙氏家族与中国近代经济	927
第七节 安徽志士在外省的革命活动	932
附录 大事编年	941
主要参考书目	977
后记	988

第十一章

西方势力全面进入安徽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侵入中国,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位于内地的安徽仍然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一时期,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英美基督教传教士率先进入安徽,他们凭借西方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内地传教权,开始全面进入安徽各州县,建立教堂,从事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为扩展势力和扩大影响,多次干涉地方事务,介入法律诉讼,激化与当地官绅和民众的矛盾,引起公愤,致使民教发生冲突。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安庆、大通辟为对外交通口岸。芜湖设立西方人把持的海关,英国并在芜湖设立领事馆,之后又在此开辟各国公共租界。地处内陆的安徽从此被迫向西方列强敞开门户,受到打着传教旗号的列强越来越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进入安徽

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皖籍士大夫的交往

西方传教势力在安徽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清之交。明代后期,正值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际。16世纪前期,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相继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向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发起挑战。自此,天主教分裂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支。为了捍卫天主教的统治地位,1540年,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狂热天主教教徒组织耶稣会等修会,一面严厉镇压新教势力,一面大力向欧洲之外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广东上川岛,在那里开始传教,揭开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序幕。^①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广东,开始在华的传教活动,在多次努力失败后,1601年1月24日,他与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以向万历皇帝进贡的名义,进入北京。^②这是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之后首次抵达中国京城的天主教传教士,标志着天主教耶稣会对华传教进入高潮。此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士大夫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确信天主教与中国的儒学在原理上并无分歧,撰文或著书,宣传西学,其中包括一些皖籍士大夫。

明末清初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密切的皖籍士大夫首推盱眙(时属泗州)人冯应京。冯应京,安徽盱眙人,字可大,号慕冈,万历二十年进士,之后赴任湖广金事。万历二十七年,湖广收税御马监监丞陈奉因施苛政,激起民变,冯应京就此上疏参劾,结果反遭陈奉陷害,被免官

^①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

^② 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入狱。

在入狱之前,冯应京曾广泛阅读了天主教传教士介绍天主教和西学的著作,深受其影响,萌生“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之感,认为天主教教义不仅与中国的儒学精神并无不同,而且有助于恢复古代圣贤的敬天事天的儒学,他还相信西学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可以弥补儒学的缺陷。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他将利玛窦的《交友论》重梓,又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作序,声称天主即先秦典籍中的上帝,并称赞该书“历引吾六经之言,以证其寔”的做法。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利玛窦抵达北京,得知冯应京对西学颇感兴趣,于是赶在冯应京入狱之前与之长谈,两人相见恨晚,自此结为好友。在入狱的三年中,冯应京曾为利玛窦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两仪玄览图》作序,又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的中译本修改和润色,并自编《经实致用编》28卷,介绍西学,其资料多来自传教士们的著作。狱中他与利玛窦保持通信往来,出狱后又曾与利玛窦在北京郊区会见。^①

另一位皖籍士大夫金声亦对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在明末清初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金声,安徽休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次年,清军逼近北京,金声以山东道御史身份任负责京营防御军队的监军。战败后回归安徽,组织义民继续抗清,清顺治二年战败遇难。

金声早年笃信佛教,之后曾广泛接触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对天主教和西学有所认识,并产生兴趣,认为与中国儒学原理大致相同。他在为同乡长辈叶鹏季所撰的《城南叶氏四续谱序》中称:“……而余适与泰西宿儒论学,颇相感触,其言万物最初一大父母,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回念而爱其大父母,遂相推心以及此兄弟,而相爱也……亲亲有杀,古谓之天秩,天秩定而万物各得其所,夫是之谓大同,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泰西不为是说,学尊性命而明物察伦,断然焉!井井焉!其必不可意假借而私游移,吾喜其与吾中土圣人大道往往符合也。”由于金声对西学有一定了解,并与天主教耶稣会士有广泛接触,因此在

^①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页。

其辞官回乡后,徐光启曾在崇祯四年奉旨向兵部开送八事,其中包括举荐金声赴澳门招募善铸炮和用炮的葡萄牙人前来助战,称:“……在告御史金声,忠猷夙着,亦习夷情,宜起补原职,遣官趋赴广省。”但金声并未应诏出仕。崇祯五年,徐光启再次推荐熟悉西学的金声负责修历,但亦被金声所拒。^①

二、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在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中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相继在广东、山东、福建、江西、江苏、河南、山东建立教区,发展一批教徒。在明末清初的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根据当时耶稣会制定的《广州至北京路程表》,17—18 世纪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从广州北上的路线为“五羊驮递运所八十里一大庾岭—江西—安徽—江宁(南京)—山东—北京”^②,这表明,尽管此时西方天主教尚未在安徽进行大规模的建堂传教活动,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多次途经安徽,安徽事实上成为他们南下北上的重要中转站。

一些安徽人在外省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702 年 11 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发回国内的信函中就曾提到,17 世纪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开始在江西抚州传教时,当地仅有位天主教徒,“这是一位来自江南徽州的青年人,他在饶州的新教堂,接受了利圣学神父施行的洗礼。但是由于他是外乡人,他很快回到他的家乡去了”^③。

17 世纪晚期,方济会中国传教团团长林养默决定将安徽作为今后重点传教地区之一。从方济会在华传教格局来看,安庆是江南和江西连接山东的一个中转站,在此地设立教堂,无疑会对沟通山东与福建、江西和广东的往来起到重要作用。^④ 康熙三十年,在南京城主教伊

^①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 324—327 页。

^② 《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举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III,22, I ,Japonica-Sinaca, 转引自陈萍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67 页。

^③ [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7 页。

^④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第 278 页。

大任派遣的几名耶稣会士帮助下,西班牙神父利安定在安庆城建立了一座教堂。西班牙传教士洪若翰在 1704 年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马尼拉的方济各会神父们……已经决定在安庆定居,此地的位置颇具诱惑力,虽然它与该省的首府南京只隔 5 天的路程,但仍派有一位特殊的巡抚。为此,他们向当时正与李明神父一起呆在广州的我通报了他们的计划。仍留在这些神父住处的康和之主教也和他们一起,恳切地请求我关心此事,并在中国官员那里为他们疏通。我给张诚神父写了信,他很快就给我们寄来了给主管这方面的中国官员的推荐书。我把这些推荐书交到了尊敬的桑巴斯卡尔神父手中。他是这些神父的修道院院长,一位功勋卓著的传教士。桑巴斯卡尔神父把这些信呈给安庆的官员们,后者同意了他向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①

西班牙传教士洪若翰神父的这封信同时还表明,至少在 1691 年安庆第一座天主教住院建立之前,利安定已在安庆进行了长期活动,并与当地官员建立了信任和联系。

方济会的西班牙神父利安定在安庆城建立教堂后不久,另一位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南怀德也来到安庆。1693 年 4 月,南怀德从广州来到南京,继续学习中国语言。同年 12 月 14 日,他受江南教区主教伊大任派遣来到安庆,住进两年前利安定神父在安庆城中购买的天主教住院,在那里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不久,南怀德的传教活动就取得良好的进展,有 30 位新教徒接受了洗礼。在传教之余,南怀德也经常拜访当地政府官员,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人际关系。几个月之后,又有数十位外教人士接受洗礼。”

1695 年,南怀德离开安庆,前往山东济南传教。1697 年,江南教

^① [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第 467 页。

区派遣麦宁学神父来到安庆，主持那里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康熙三十七年，时任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团长的恩若瑟神父巡视各省教区时来到安庆，对这里的教堂作了如下描述：“抵达江西省安庆城之后，我参观了我们建在城外的教堂，其同吉安的教堂一样，时至今日依然非常的洁净和庄重，‘客厅’和门显得非常的精致。靠会院一侧有一空地，可用于建一座很好的教堂。为使这间会院更加完美，应将‘门楼’或称其为大门一侧的几间小房舍买下来。”

1702 年，罗马教廷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杨若翰和包道宜也来安庆传教，因杨若翰对中国尊孔敬祖持宽容态度，被教廷革职。1710 年，作为方济各会在安庆传教活动的奠基人利安定重返安庆，次年病逝。^①

位于皖东北的五河，成为这一时期天主教在皖传教的另一重要地区。康熙三十八年前后，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受许甘第大（徐光启的一个孙女）的侄子的邀请，来五河地区传教。卫方济，比利时人，1687 年来华传教，1692 年之后主要在江西南昌进行传教活动。^② 他来到五河后，为当地数百新人教的信徒施行洗礼。^③ 1703 年，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在向罗马耶稣会总会长汇报关于中国传教区现状时提到，耶稣会在江南省的五河已经建有教堂^④。他在信中写道，“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基督教徒的热情也很高，尤其在开始阶段。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小城芜湖（应为五河，下同）和在芜湖的乡下。我第一次出访那里，就为 116 人施了洗礼，第二次达到 560 人，其中有 18 至 20 个业主和一位曾在一座小城为官 10 年的官吏。这样巨大的成功使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建造一座教堂，并在周围乡村又造了另外两座规模较小的教堂和其他若干小教堂。”^⑤ 卫方

^①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第 265 页。

^②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460—461 页。

^③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9 页。

^④ 所引书译者将卫方济信中所说的“Ou-ho”误译为“芜湖”，其实正确的译法应是“五河”。

^⑤ [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第 232 页、237—238 页。

济在五河施以洗礼的一些当地人日后成为著名的耶稣会士,其中包括五河人许立正。^①

康熙四十一年,卫方济回欧洲,留传教士思安当、方惟一继续进行传教活动。次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五河建立住院。^②康熙五十九年,法国遣使会派传教士来五河,在城外建立教堂,发展教徒。此前,法国耶稣会士郭中传已来到五河(时属江南凤阳府),一年后离开五河去浙江宁波,1741年1月在中国澳门去世。1772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耶稣会士南怀仁^③,亦在五河传教。^④

清初,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足迹还抵达徽州婺源的东门镇,在那里发展了一批教徒,东门迅速成为江南教区在皖南的重要传教据点。在这批教徒中,包括18世纪末著名的华人耶稣会士姚若望,他后来来到苏南,协助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在当地传教。在清廷对基督教实行严禁政策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从江苏省撤出,姚若望仍在当地秘密进行传教活动。^⑤

总体来说,在18世纪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已经进入安徽南北,然而,除了安庆、五河和东门之外,天主教江南教区在安徽的传教活动进展并不顺利。法国的传教士们自己也承认,江苏已有10万名教友,其中8万名就在上海附近;相反,在安徽,除了教友比较多的五河以及南部的东门外,对传教来说,还全是荒地。尽管如此,安徽在明末清初的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播格局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严厉限制,安徽的安庆、五河和东门的天主教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在当地建立的教堂、住院及田地被查抄,教徒四散,西方天主教在皖的传教活动完全陷入中断。

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重返安徽

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门户。1842年,清

①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312页。

②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66页。

③ 与康熙时期曾任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同汉语名。

④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273—274页、348—349页。

⑤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9页。

政府在战败后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鸦片战争之前，罗马教廷将在中国的天主教事业置于葡萄牙掌控之下，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这一情况就发生变化。1843年，罗马教廷任命法国天主教神父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所谓“保教权”已经为法国所掌握。从此，法国传教士便成为向中国进行宗教扩张的急先锋，而法国政府则扮演来华传教士的后台和坚定支持者的角色。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除在华享有英国在《中英南京条约》中所享有的所有特权之外，法国人有权在已开放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还明确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法国在华传教士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通过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清廷于1846年颁布谕旨，准免查禁天主教，并归还雍正以来被查抄的天主教教产。^①这样，在中国已被查禁120多年的天主教正式解禁，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再次大举重返中国。位于浅内陆地区的安徽省亦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势力随即开始恢复在安徽的传教活动中，前天主教在皖北主要传教的五河地区首当其冲。1846年6月，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马日新来到五河。次年，希腊籍传教士龙保理被任命为负责江南教区西部的传教事务，也来到五河，并以探望教徒为由，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在当地的活动。从1849年至1864年的15年间，包括薛孔昭、马日新、赵方济、葛必达、桑理爵等一批地位显赫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来过五河。^②

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再次进入安徽，引起官府的极大不安和城乡士绅的强烈抵制。晚清曾有传闻，称英翰出任安徽巡抚时，秘密杀死来皖传教的两位英国教士及翻译、随从多人，清末文人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记录此事，^③但未有其他史料证实。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0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236—6237页。

^② 翁飞等：《安徽近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271页。

^③ 张祖翼：《强臣擅杀洋人》，见《清代野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55页。

尽管遭到地方官员和城乡士绅的强烈抵制,但并不能阻止天主教传教士继续拥入安徽各州县。至1908年清王朝灭亡前夕,根据安徽官方统计,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已在安徽建立283处教堂,几乎遍布全省各州县。其具体分布情形如下:

安庆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37处,其中怀宁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6处;桐城县有法天主分堂1处;潜山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太湖县有法天主总堂3处(其中1处后撤)、分堂11处;宿松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8处;望江县有法天主分堂2处。

徽州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8处,其中歙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休宁县有法国天主总堂1处、分堂3处;婺源县有法天主分堂2处;绩溪县有法天主分堂1处。

宁国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45处,其中宣城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25处;宁国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4处;泾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2处;南陵县有法天主分堂1处。

池州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44处,其中贵池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7处;青阳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6处;铜陵县有法天主分堂5处;石台县有法天主分堂2处;建德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4处;东流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6处。

太平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11处,其中当涂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芜湖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繁昌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7处。

庐州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13处,其中合肥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5处;舒城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3处;无为州有法天主总堂1处;巢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

凤阳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28处,其中凤阳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怀远县有法天主堂1处;凤台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6处;宿州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7处。

颍州府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28处,其中阜阳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颍上县有法天主堂1处;霍邱县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亳州有法天主总堂1处、分堂1处;涡阳县有法天主总

堂 1 处、分堂 13 处；太和县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3 处；蒙城县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2 处。

广德州直隶州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 24 处，其中广德州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15 处；建平县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7 处。

和州直隶州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 5 处，其中和州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1 处；含山县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2 处。

六安州直隶州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 26 处，其中六安州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11 处；英山有法天主分堂 4 处；霍山县有法天主总堂 2 处、分堂 8 处。

泗州直隶州共有法国天主教总堂、分堂 11 处，其中泗州有法天主分堂 1 处；天长县有天主分堂 1 处；五河县有法天主总堂 1 处、分堂 8 处。^①

上述情况表明：首先，清末皖省各地天主教堂，均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所建或为其名下；其次，安庆府、池州府和泗州直隶州的五河县等天主教早期传教地区，清末仍是天主教势力最活跃地区；第三，位于皖南的宁国府和广德直隶州，作为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新辟重要传教区域，天主教势力发展迅速，其教堂数甚至超出老传教地区；第四，从全省看，天主教教堂数量大大超出基督教，是后者的近 2.6 倍，但是在安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芜湖和庐州、安庆、滁州等中心城镇，天主教势力并不占有明显优势，在芜湖甚至处于下风。

四、新教各派传教士进入安徽

16 世纪前期，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德国、法国、瑞士、英国陆续产生一些脱离天主教的新宗派，统称新教，又称基督教，主要包括路德宗、卡尔文宗和安立甘宗三大派。后新教又不断分化，派系日繁。新教在中国的传播远远晚于天主教，始于 1807 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直至 1814 年，马礼逊才为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新教与天主教一样，被严格禁止在华传教，活

^① 冯煦主修：《皖政辑要》交涉科卷六《教务二》，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29—61 页。

动被限制在广州和澳门。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不过 20 余人，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 100 人，其中多数是教会学校学生或教会雇员。新教各派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到 1905 年时有 63 个单独的差会，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财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①。清代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主要宗派为：公理宗、长老宗、信义宗、浸礼宗、监理宗、圣公宗和内地会。^②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新教传教士大举进入中国内地。1865 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在上海建立总办事处，负责在华传教事务。1869 年，内地会派遣英国传教士密道生、卫养生率先来到安庆，开始在那里传教，基督新教从此正式传入安徽。^③ 内地会传教士克服各种困难，包括当地乡绅势力的强烈反对，终于在安庆建立了基督教教会。之后，内地会继续在皖南地区活动，分别在安庆、宁国、池州、歙县建立基督教堂，作为传教据点。

1885 年，美国圣公会恢复在安徽的传教活动，在芜湖建立总堂，1894 年又在安庆建立总堂。

1886 年，基督会在南京建立在华传教总部，1890 年，基督会派遣美国和澳大利亚传教士在安徽滁州、庐州、芜湖建立宣教区，开始传教活动。

1887 年，美国贵格会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宣教中心，随后派传教士在安徽无为一带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

1898 年，美国来复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江苏和安徽作为主要传教地区，在和州、芜湖建立总堂，从事传教活动。^④

根据清末安徽官方统计，至 1909 年，基督教各派在全省先后建立 125 所总堂或分堂。其具体分布如下：安庆府共计 15 处，其中怀宁县有美国圣公会分堂 2 处，英耶稣分堂 1 处；桐城县有美耶稣分堂 1 处，美圣公会分堂 2 处；太湖县有英福音总堂 1 处，美圣公会总堂 1 处、分堂 2 处；宿松县有美福音总堂 1 处、分堂 2 处，美圣公会总堂 1 处；望

① [美]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4 页、612 页。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3—154 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 2 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76 年版，第 761 页。

④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外事侨务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3 页。